

“马家药军”背后的角力

■本报记者 周益

“有人存心整我!”2001年4月下旬,传奇教头马俊仁终于向媒体大倒苦水,因为在前一年的悉尼奥运会前夕,他麾下的“马家军”竟然在出发前被拿了下來,理由是“飞行血检不合格”。

关于“马家军”服用兴奋剂的传言,过去从未在正式文字中被证实。所以,在人们的印象中,马俊仁成了一个“被人整垮”的悲剧英雄。

而这本第一次揭开了此事的历史真相……

谢亚龙也曾披露……

当时的人们都知道马俊仁不容易,在与王军霞等第一批弟子决裂后,这一期“马家军”不光倾注了马俊仁的心血,还有辽宁省领导的支持,在马俊仁的几次名誉官司中,辽宁名律师谷开来还亲自为他辩护。1997年在第八届全国运动会上,第二代“马家军”队员姜波和董艳梅先后打破女子5000米的世界纪录。“马家军”似乎东山再起。

可是,到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夕,获得奥运会参赛权的7名“马家军”队员中有6个被通知取消前往悉尼的资格,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一直无人知晓。

2005年3月初,刚刚坐上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位置的谢亚龙忍不住跟记者爆了个料。

据谢亚龙透露,他在担任田管中心主任的时候,“曾经三次查出马家军队员服用兴奋剂。”这个事就发生在备战悉尼奥运会的过程中,所以马家军就此消失在赛场上。



马俊仁如今专心养藏獭。

可是,由于谢亚龙随后陷入中国足球屡战屡败的泥潭,这个惊天内幕也只在媒体上一闪而过。

不过,袁伟民在新书中披露,为了打击兴奋剂,拿下“马家军”后,他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袁伟民:“大不了我不干了”

据袁伟民书中回忆,悉尼奥运会前,国家体育总局对中国的参赛运动员进行了“飞行血检”,随后,国家体育总局召开紧急会议,宣布

体育总局已决定所有血检超标的中国运动员均不得参加悉尼奥运会。

受这项决定影响最大的是人们所熟知的某省女子中长跑队,他们获得奥运会参赛权的7名队员中,2人尿检阳性(其中1名血检也超标),4人血检超标,7人中有6人被证实使用了兴奋剂或者有强烈的使用兴奋剂嫌疑。

在收到国家体育总局向国务院汇报“血检超标”事件的报告的同时,一位国务院领导人也收到了该省一位负责人的一封信,要求对运动员再进行一次血检,以便让该省女子中长跑运动员重新获得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的机会。

袁伟民对“能不能重查”心里是一清二楚的。他明白,这是一个和兴奋剂斗争的常识问题:国际上之所以使用“飞行检查(突然到达)”的办法,是因为现代科学的发达,使得运动员在使用兴奋剂之后,可以再使用“掩盖剂”迅速消除兴奋剂的痕迹。如果同意“重查”,提出希望重新检查的人做好了准备,是能够保证再次检查时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事实上呢?一旦通过了检查,拿到去往奥运会的通行证之后,难以保证他们就不再使用兴奋剂了,毕竟目标是为了成绩,带着这些“危险品”去悉尼,在检查水平更高的奥运会赛场上,我们的运动员被查出服用兴奋剂的可能性岂不是更大?国际影响岂不是更坏?他们不但无法为国争光、夺取奖牌,甚至连北京申奥的前程有可能都会被搭进去。

在书中,袁伟民说:

“可是,某省领导不断地给我打电话,要求给机会‘重查’,这个本子上都记着呢:2000年9月5日,下午该省一位主要领导来电话谈血检问题,电话打了50分钟。晚上到家里,该省另一位主要领导又来电话,谈血检问题,电话打了25分钟,主要内容就是要求‘重查’,说再查有问题我们就不去,没问题就去。”

“第二天,该省的一位副书记和一位副省长,还有体育总局专程来京找到我,为此,安排了一个座谈会,总局领导都出席了,谈了两个小时。这位副书记修养不错,对这个问题谈得比较客观。但另一位省领导好像对反兴奋剂的情况了解甚少,还说据她所知,国际上运动员都在用,意思是我们不用就吃亏了。当时在会上我批评了该体育总局,批评他没有如实地向领导汇报国内外反兴奋剂斗争的情况。”

“但是不管如何耐心地做说服工作,他们仍然不断在做工作,尤其是努力争取上级领导的支持,要求重查一次。一位上级领导在9月6日和7日晚两次打电话,一次40分钟,一次45分钟,潜台词都是传达有关方面希望‘高抬贵手’。”

袁伟民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考虑个人的乌纱帽,也许就会让那些血检超标的运动员一下子恢复“清白”,出征悉尼奥运会。

但他顶住了各方面压力,坚持不重新进行血检,坚持不让所有血检超标的运动员参加悉尼奥运会。

袁伟民想:大不了从悉尼回来我不干这个局长了……

审计风波的来龙去脉

■本报记者 周益

袁伟民有一次坐出租车路过北京龙潭湖国家体育总局,没认出他的司机指着边上的一栋楼对他说:“看,那就是袁伟民搞的‘腐败楼’!”

2004年雅典奥运会前夕,国家审计署披露了当年的审计报告,其中,“1999年以来,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1.31亿元,其中用于建设职工住宅小区1.09亿元……”被曝光,而央视在播出这条新闻时,所用的背景画面,都是龙潭湖畔中国体育大本营办公楼前那块醒目的牌子——“国家体育总局”以及龙潭湖职工住宅小区。

可是,袁伟民作为国家体育总局的一把手,没有就此事接受过任何媒体的采访。

一年后,体育总局因为没有及时整改而再次被点名,此时的袁伟民已经退休,依旧传言四起。

在这本新书中,他有话说……

所谓“专项资金”

袁伟民在书中首先对那笔“专项资金”进行了解释。

袁伟民说:“体育总局办公会通过的方案是:按‘三结合’的规定,龙潭湖新建职工住宅所需的3亿多

资金,主要由参与集资建房的体育总局下属事业单位和住户职工个人(占总集资2/3)筹集,其余1/3部分可以用体育总局的自有资金(去年财政拨款结余部分转为下年使用,即为自有资金)。可是,当年体育总局可动用的自有资金只有2000多万了,尚有1亿左右缺口,考虑到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国奥委会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中国奥委会市场开发多年积累的资金尚有结余,所以决定从中动用一部分来弥补本应用国家财政拨款的体育总局自有资金来支付的缺口。”

在审计报告中,这部分钱被定性为“专项资金”。

袁伟民说:“事实上,中国奥委会的账户上既没有财政专项拨款,也没有其他有专项用途的‘专项资金’,这些钱是10多年来各单项协会和中国奥委会进行市场开发积累下来的,主要是八九十年代运动员、运动队做广告所得,以及参加国际奥委会、亚奥理事会和国际单项协会组织的比赛和大奖赛的分成。都是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工作者艰苦拼搏的血汗钱。取之于他们、用之于他们,应该说也算合理。”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在解释的同时,袁伟民还披露了一件事情:

“既然建职工住宅的事我们1999年就立项了,2000年至2003年国家审计署审计时都没说是问题,怎么审计署换了一个人管之后,就突然说有问题了。我和志坚很想听听该同志的新看法,弄清楚我们是不是真有问题。我们特意把这位同志请到了总局,我和志坚两人一起耐心地听他谈,希望他不要有任何顾虑地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这位同志就体育总局动用中国奥委会资金建职工住宅问题的本身并没有进行分析解释,而是十分生气地提了一大堆体育总局有关部门在接待他们的过程中安排不妥的问题,譬如只给他们安排了一间专门办公室,连水都不给喝,到了下班的时间就匆匆忙忙让他们走等等,我和志坚听后当面表示了歉意,并表示今后改进,配合他们搞好审计工作,希望能实事求是地审计体育总局的有关问题。这位同志见我和志坚的态度较诚恳,这才有点息怒,但回答了一句令我和志坚及当时

在座的参加国务院联合调查组的监察部、审计署其他同志大吃一惊的话,他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我和志坚马上意识到了,我们有关部门当初的接待不周,恐怕是造成今日这种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坐在一边旁听我们谈话的同志都面面相觑……”

为何被再次点名?

袁伟民表示,事实上,雅典奥运会归来,有关体育总局的审计问题,已经调查清楚。

袁伟民说:“在2005年2月18日,国家审计署署长亲自来到国家体育总局和几位领导成员进行了沟通,审计长的讲话要点是:国家体育总局被审计的问题是名义、程序问题,花中国奥委会的钱,要由中国奥委会讨论,不能由行政开会决定;雅典奥运会前公布此事是疏漏;体育总局的问题可以向全国人大讲,也可以不讲,如果一开始知道是名义、程序问题,可以不讲。审计长这次亲自向体育总局所作的内部表态,事实上已经否定了在2004年6月向人大常委会所作审计报告中,将国家体育总局的问题

归类到‘挤占挪用财政拨款和其他有专项用途的资金’类别中去的说法,也可以说是用一种新的说法更正了原来对体育总局问题的定性。”

可是,在2005年6月28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对去年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时,审计署又点了体育总局的名,说“除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中国奥委会的资金尚未落实整改外,其他都已整改”。

对于这个点名,国家体育总局一直没有正面回应。

袁伟民在书中表示:“体育总局坚持实事求是进行整改,如果归还了,审计情况又不加说明地公布体育总局已经整改。这样海内外舆论、所有人就都会认为,体育总局已不得不退赔出‘挤占挪用的财政拨款和专项资金’,不得不退赔出了造‘贪官楼’‘腐败楼’的资金,就将永远成为一项‘惊天大案’被写进历史,被社会扭曲。”

5年过去了,离2004年审计风暴席卷体育总局,已经整整5个年头,体育总局至今也没有“退赔”这笔钱,这个“谜”也一直没有被公开,直到袁伟民新书的出版。